

乡愁

牛铃响起
的时光

乡愁

表妹夫竟还养着八头水牛！如今，我的家乡，这个全国最大肉牛基地的十里八乡内，怕是独一家了。

那天，我问表妹夫，如今家家都养长膘肉的水牛，你何苦守着这耗时耗料的水牛？

他蹲在牛栏边，眯着眼看那悠然反刍的牛群，淡淡地回我一句：“我家祖辈以来都养它们。水牛只吃草，以前还能犁出一家人糊口的指望呢。”

话音落处，一头牛颈下悬着的铜铃，被它摆拨出几声寥落的清响。这寥落的铃声，像一把钥匙，猝不及防捅开了我那尘封已久的记忆。

我生长的家乡包鸾坝，是一个被青山环抱的山间盆地，方圆十里，水田连绵坝上，自古是丰都的米仓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前，包鸾坝还有部分烂泡田，泥脚深得能淹没人的整个下半身，黏稠而深沉的田壤，唯有水牛那宽厚如船的身躯，沉重如山的力道，才能犁开一片春华秋实。那时的家乡，是一片被水牛脊背驮起的乡土。

我的大多数童年和整个少年，都与一头大水牯牛紧紧系在一起的。它是我们生产队唯一能耕深泥脚田的水牛，也算是大家的宝贝。

它的体形比一般水牛硕大健壮，皮毛被我家养得油光水滑。最慑人的是，它那对粗大而光亮的犄角，呈外翻的圆弧，透着原始的、令人心折的彪悍。

但它的脾性，却与外貌全然相反，出奇的温良。我五岁便开始照养它，那时，家乡的田埂和河滩都被种满庄稼，放牧得去三五里外的大山上。我人小腿短，走路是赶不上它的，于是它的背，便成了我移动的童年。

骑牛上坡、下坡，是岁月教给我的独门技艺。上坡时，我顺骑着，身子紧贴着它温热的脊梁，有时甚至能感受到它皮肤下波浪澎湃的脉动。下坡路陡，我调转身子反向骑坐，用手攥住它的尾巴根，任凭风呼雨滴，恰是稳坐钓鱼船。日子久了，我们仿佛达成默契：清晨，我在牛棚里解开它的牵绳，说声出门了，或是黄昏时，喊一句回家了，即使它昂起高头时也会立即顺从地低下来，我便踩着它那布满旋毛的宽阔额头，手脚并用，从它的颈项滑溜到背上去。

它有时也像我年少一样地淘气。遇有大石块的路面，它会拐脚踏坏路边几垄谷，偶尔会趁我不注意，迅速地捞一口路旁邻里家的白菜，或是队集体的几株秧苗。

村里人看见了，多半只是远远地笑骂一声：“看嘛，又是忠勇那娃搞的个！”那语气里，有几分无奈，更有几分对我和水牛的宽宥。这份宽宥，大约就是来自大水牛为这片土地的无私付出。

那条放牧的路途，现在想来，竟是我一生中最安稳的航行。

然而，所有的航程都有终点。在我放养十年后的一个冬日傍晚，我看见父亲正守着火炉，熬着一罐气味刺鼻的中草药。他说，牛怕是不行了。我随父亲端着药汤进棚，它卧在地上，听见我们的声音，挣扎着想要站起，后蹄努力蹬地，身体不断前躬，试了几次，终又沉重地倒下。就在那时，我看见，一串浑浊的泪水，从它那双红肿的眼眶里汩汩地流了出来，淌过满是皱纹的脸颊。那眼神，我至今记忆犹新无法忘怀，那不是动物的茫然，而是浸满着悲凉的通透，仿佛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者，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命运的结局。

第二天下午放学回家，院子里集中了全队的男女老少，有的围着两块巨大的尚在滴血的鲜肉，有的围着一口冒着香气的大铁锅，他们讨论着这牛肉和下水如何才能公平分配，队长和几个年长的男人，则站在一旁，摩挲那张刚刚剥下的宽大、厚实的牛皮，盘算着能卖怎样的价钱。

怔在门口，隔壁的郎二嫂喊一句：“忠勇，你娃没得牛照了喔！”

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热血上涌，哭音嘶吼：“哪个杀了我的牛？”

父亲慌忙将我抱住。我的愤怒与悲伤，在那一片即将因有肉吃而感到无比欢愉的人群里，显得突兀和可笑，引得众人一阵哄堂大笑。那哄笑，像烧红的针深深扎在我心上。那一幕，刻骨铭心。

后来，父亲又买过一头水牛来喂，那时我在外读书，与那头水牛终究是生疏的。

再后来，小型农机开进田间地头，那需要水牛才能耕作的深泥脚田，渐渐成了过去。

在表妹夫的牛栏前，我听着那叮当的铃声，恍如隔世。这铃声，曾响彻包鸾坝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，如同这片土地的呼吸与心跳。

现在，我还常在梦里见到这样的画面：我的大水牛，它温顺地低着头，我踩着它的额角，爬上它宽厚的背，然后，一步一步，稳稳当当地随着清脆的牛铃声，走向未来的时光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、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、丰都县文联副主席）

前几天，和老同学闲坐聊天，又笑着说起了关于后坪村小的往事。

听《巫溪县教育志》编写组的人讲，到今年3月，全县村小只剩5所了，在校学生拢共95人。我们当年的后坪村小，也已停办。如今，村里的孩子大多去镇上读书，还有的跟着父母进了城。学习条件是越来越好了。

今年，奔六十的我，头一回进驻后坪村，参与乡村振兴工作。也是在村里，我遇见了陈启全老师——一个在村小讲台上站了整整42年的乡村教师。

从村里读出去
又回到村里教书

陈启全至今记得，1979年，他初中毕业那年，两个毕业班共有93名学生，却只有两名学生考上高中。陈启全是其中之一，而考上的另一个同学，因家贫，凑不齐10块钱的学费，没读成高中。

1981年，陈启全高中毕业，曾明卓校长来找他：“后坪村小停办快两年了，你跟宋永见回来把学校办起来吧，不能让娃娃们没书读。”

陈启全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没想到这一教就是四十多年。

四十多年前，村小没固定地方，老师来了，才有学生。老师走了，学校就散了。陈启全回村时，刚好空出一间吊脚楼。这吊脚楼以前是养猪场和公屋，收拾收拾便当了教室。

一招生，当年就来了124名学生，挤成两个班。

陈启全和妻子兼村小同事就住在学校下边，早晚种地，晚上改作业。孩子们从他家门口过，在他眼皮子底下去上学。

有的女老师背着娃儿上课，右手写字，左手拍娃。娃儿哭了，她赶紧出去哄。大点的学生，也背弟妹上学，弟妹在背上流口水，他们在底下认字。还有的读着读着就请假不来了。

陈启全每个礼拜都要去家访，少说三四趟，多半是去把不上学的孩子叫回来。

家长往往把挂在灶上的腊肉切了，煮一大碗荷包蛋端上来，绕来绕去说家里的难处。

陈启全斯斯文文坐着，话软但口不松：娃儿得回学校。

有一回，下大雪，一个男娃病了半个月没来。

陈启全隔几天就走十多里山路，去给这个男娃补课，雪埋到小腿。

一次天黑，他回不去，就睡在男娃家。男娃家里的被子又硬又短，他和男娃一头一个。半夜冻醒时，陈启全发现娃儿悄悄把他的脚拉进怀里捂着。

两块钱的学费，那时候能把多少人家难住。陈启全从每月十四块的工资里往外掏。

每到杀年猪的时候，家长走几里山路来接他，扯着袖子拉，非要拉他吃顿杀猪饭。

“这份情，一辈子都还不完，只有好好教书来回报。”陈启全说。

陈启全老师教过的娃儿，如今有的在重庆，有的在北京，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。有的回来过，有的没有。

他说：“我的孩子从这所村小走出去，有的研究生毕业后，在网易编程当讲师，年薪过百万。回不回来不要紧，心里记着这个地方就行。”

两条凳子带回一条
他的小屁股被打开花

有事，沈小明（化名）一辈子忘不了。

那年，老师让他带两条凳子到村小。他到了才发现，别的同学只带了一条凳子。

小小少年心里不服气，扛起一条凳子就往家走，凳腿一颠一颠的，像在跟他较劲：凭什么别人家出一条，我家得出两条？

还没进院子，沈小明就看见老师早坐在堂屋里，他爸

的脸黑得像锅底。他一只脚刚进门，巴掌就像雨点一样落下来，屁股火辣辣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沈小明老老实实扛着凳子回学校，把高的当课桌，矮的当凳子。一坐下去，屁股像被针扎了一样，身子猛地弹起来。可他就那样半悬着屁股坐着，扭来扭去，谁也不知道他屁股上青一道紫一道，扭也疼，不扭也疼。

后来，沈小明才知道，他爸让他多扛的那条凳子，是为隔壁家出的。那家娃娃多，穷得连条像样的凳子都拿不出来。20世纪80年代，不少村还是文盲村，“报纸没人念，记工使竹片，会计外面找，识字没老师”。可那时，村里的人都知道读书重要，家长们纷纷把放牛娃往学校里赶。为了让娃儿读书，啥法子都想尽了，家家养几只鸡，叫“鸡屁股银行”。有的用鸡蛋抵学费，集齐三五个鸡蛋，就送到老师手上抵学费。

如今，为一条凳子不平的那个娃儿，后来在城里闯出一片天地，比他小时候想的走得远得多。

小村连着大城，连着远方，来来往往。起跑线早不是当年那条田埂了，它在变宽，在变平，在往远处延伸。

散落在各处的孩子
曾聚在最气派的三层楼房

时光匆匆，记忆再回到2005年。那年，后坪村小盖起了三层教学楼，那是全村最气派的房子。

每周一升旗，成了村里最隆重的事。学生最多的时候，一到六年级六个班全满，9名老师，257名学生。学校像个大磁铁，把散在各处的孩子都吸拢来了。

老支书把家安在学校后面。他蹲在樱桃树下，眯着眼说：“天天早上看着娃儿们追着跑着来上学，那才叫热闹。”

“有些娃儿调皮得很，花生才开花，就把藤子扯起来看结了果没有。”老支书曾站在地边吼，娃娃们满嘴泥巴，冲他傻笑。

2014年，白鹿镇中心小学搬了新地方，全镇的村小都合到一处。陈启全也随着最后6个班100多名学生转到镇里。

2025年12月，陈启全退休了，他搬到县城住，但隔三岔五还要回后坪村，在自己老房子里住几天。

“其实是好事，村里的娃娃们去镇上读书，路修好了，学校的条件好了，老师更强了，娃娃们的眼界会更宽。”陈启全想得明白，“这是国家让每个娃儿都能上好学，城乡之间的差别，校与校之间的差别，正一点一点抹平。”

最近听说，重庆市交委今年要把农村娃儿上学“希望专线”当成大事来办。以后，专门开通从家门口到校门口的班车，让村里的娃儿上学越来越安全，越来越方便。

后坪村的娃娃们
开始回故乡了

从后坪村小走出去的娃娃们，开始有人回来了。

村支书陈赐荣是个“80后”，当年他的妈妈在后坪村小教书，前面提到的女教师背上背着娃儿，那个哭的娃娃，就是小时候的他。

陈赐荣也曾在村小读书，在操场上跑步，后来读了中专。本来他可以在城里找工作，可他选择回村了，还当上了村里的带头人。

“00后”谭周靓大学毕业也回来了，作为村委会本土人才，谭周靓负责民政工作，为老人、低保、特困人员服务工作。如今村里最高龄的老人，已经95岁，耳朵听不清，每次上门看望，谭周靓说自己像老人的重孙，贴着脸大声说话聊天，亲得很。

他们这代年轻人走出去，是为了有资格回来。他们身上有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对这片土地亲，亲得没道理，就像水流往低处，树扎根土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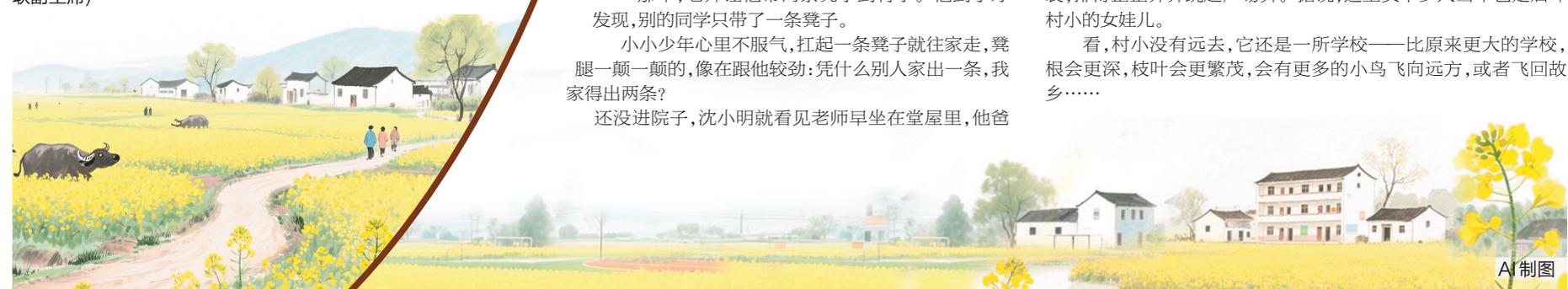
原来的后坪村小学，现在变成了燕子村党群服务中心。三月天，油菜花开得正旺，黄灿灿的一大片，花海里浮着一树树白的李花、红的桃花。那栋曾是全村最豪华的房子——三层楼的老校舍还在，操场改成了跳坝坝舞的场子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服务中心的灯亮起来，操场上喇叭响了，放的是《最炫民族风》。村民们换上漂亮衣裳，排得整整齐齐跳起广场舞。据说，这里头不少人当年也是后坪村小的娃娃儿。

看，村小没有远去，它还是一所学校——比原来更大的学校，根会更深，枝叶会更繁茂，会有更多的小鸟飞向远方，或者飞回故乡……

乡愁

你可曾记得
后坪村小

余明芳



AI制图